

我今年读的最好的小说就是拉维·哈吉的《异乡变形记》。这是本黑暗的小说，叙述技巧高超，下笔生动有力。阅读时，我常常兴奋得跳起来。

——科尔姆·托宾



异乡变形记

「加拿大」拉维·哈吉 著

黄少婷 译

我一半是人，一半是蟑螂

异乡变形记

Rawi Hage
Cockroach

「加拿大」拉维·哈吉 著
黄少婷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乡变形记/(加)哈吉著;黄少婷译.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29-4372-2
I. ①异… II. ①哈…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0659 号

图字:15-2013-150

RAWI HAGE

COCKROACH

Copyright © 2008 by Rawi Ha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OUSE OF ANANSI PRES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异乡变形记

[加拿大]拉维·哈吉 著 黄少婷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372-2
定 价 29.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献给拉姆齐、詹妮和纳达，是他们带给我微笑；

献给我的兄弟们；

献给丽萨，这是我们的约定；

献给热爱东方的麦德琳；

也献给我那些流亡的朋友们，愿他们归来。

我们所称的物种，是同一个物种的各种退化形式。

——伊西多·圣-希拉尔，

《埃蒂安·乔弗罗伊·圣-希拉尔的一生》^①

那时，萨塔瓦耶斯出现，降福人世，将河水引向七个国家。（随后，）皎洁美丽、恩赐祥和的（蒂什塔尔）光照地面上的国家，使其享有好年成。

——《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②

① 伊西多·圣-希拉尔(1805—1861)和埃蒂安·乔弗罗伊·圣-希拉尔(1772—1844)均为法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后者是前者的父亲。

② 《阿维斯塔》，波斯古经，是伊朗最古老的文献。此处采《阿维斯塔》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元文祺译文。

我爱上了索瑞。但是我不再相信自己的情绪。我从来没有和女人一起生活过，也没有正儿八经向谁求过爱。而且我一度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随便碰上哪个雌性都克制不住想去勾引和占有。

只要一看见女人，我就感到自己的牙齿变薄、变长、变尖，我的后背弓起，额头上冒出两根长长的触须迎风摇摆，以吸引对方的注意。我渴望爬到邂逅女人的脚下，从下往上欣赏她们挺拔的身姿和精致的脚踝。我还感到恶心——是恶心而不是尴尬——一种黏糊糊的狡猾和迫切感。这种奇异的感情与本能的混合物占据了我的身体，迫使我接近这些女人，就像钟楼怪人出现在一群女学生面前。

也许又该去找我的心理医生聊聊了，因为近来这种感觉压得我喘不过气。尽管连心理医生都开始引起了我的饥渴感。最近，当我看见她和一个同事谈笑风生时，我突然意识到她也是个女人。而当她坐在我的对面，让我把这种感觉展现给她看时，我把手放在了她的膝盖上。她岔开话题，镇静而一脸同情地掸开我的手，把椅子往后拖了拖，说：

“好吧，那么我们来谈谈你自杀的事。”

上个星期我向她承认过去的我更勇敢、更无忧无虑，也可以说更残暴。但是在这片北国的大地上，没有人给你打砸抢的借口，你甚至找不到理由朝着阳台对面大喊大叫，问候邻居的老娘，威胁他们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告诉心理医生，她说我压抑着很多怒气。于是我在她离开房间的片刻打开她的手提包偷了她的口红。等她回来后我继续向她讲述我在他乡的成长经历。她时不时用一些问题打断我，比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受？再告诉我一些。大多时候她只是听我说，一边记笔记，而且周遭环境也不是什么充斥着樱桃木和皮沙发（或者古代航海地球仪）的豪华诊室。不，我们面对面坐在狭小的公共卫生所办公室里，中间只有一张小圆桌。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向她描述我和女人们的关系。我多次试图告诉她我自杀只是为了摆脱无休无止的太阳。我坦率地用有限的心理学知识和口才试着向她解释我自杀是因为好奇，或许是为了挑战自然，挑战宇宙本身，挑战那永恒的光线。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压抑。存在的问题把我耗尽了。

心理医生简明扼要的做派让我恼火。她引发了我自离开家乡后就未曾体会过的施暴欲望。她不明白。在她看来，什么事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和异性的关系。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对抗这个我无力参与也无力控制的世界中的压迫力量。最可恨的一点是，她时不时会探过身来，面无表情地说：你希望我们的谈话得出什么结果？她总是在嫌我说得不够多的时候来这一套。

我忍无可忍：是法院逼我来这儿的！我不想来。但是我吊在树杈上的时候被一个穿紧身衣的跑步者发现了，他叫来了园警。两个骑警骑着高头大马把我救了下来。那时候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两匹马

上。我那时觉得马倒是个解决技术问题的好办法。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能骑在其中一头畜生上面，我就能够到更高、更粗壮的树枝，把绳子牢牢系在上面，然后把马放走。可惜现实是我被铐上手铐，然后被送去——按他们的说法，就是做评估了。

跟我说说看你的童年，心理医生对我说。

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只虫子。

哪种虫子？她问。

蟑螂，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姐姐把我变成了蟑螂。

你姐姐做了什么事？

过来，我姐姐对我说。我们来玩吧。于是她撩起裙摆，把我的后脑勺放在她两腿之间，把脚后跟抬起来，慢慢地在我上方晃动着双腿。看，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她说。然后她开始摸我。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牙齿，我的腿是你长长的胡须。我们笑着钻进被窝里，轻轻吸对方的脸。我们来把光挡住，她说。我们用被子把床封住，密封住，这样就不会有光了。我们去地底下玩。

有意思，心理医生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多聊点类似的故事。下个星期见？

下星期见，我说着站起身，经过诊所的墙壁，走下楼梯，走向冰冷明亮的城市。

回到家，我看到水池里堆满了杯碟，荧光色的一元店杯子和花朵图案的碟子混杂在一起，上面垒着一只硕大的意大利面锅，全都是脏的。没等我去拿那死气沉沉的拖鞋换上，和我一起生活的蟑螂就慌慌张张

地钻进下水道逃命去了。

我觉得饿。我口袋里没剩什么钱。看来该去找那个叫雷扎的伊朗音乐家讨回我借给他的四十元。我下定决心要把债讨回来,而且已经对那杂种失去了耐心。我甚至开始寻思着,要是他敢赖账就砸了他的萨恩蒂厄琴。他寄居在街角的那家艺术家咖啡馆。这家店一天二十四小时营业,整整二十四小时,里面聚满了从新移民肺中吐出的烟雾。这些人懒洋洋地坐在塑料椅子上,手肘抵着圆台面,用手挥舞着他们的不满,用香烟染黄的手指召唤着服务生。为了与他们相配,服务生就像印第安烽火柱,长着呆若木鸡的脸,鼻子就像奔向红布去做最后一搏的西班牙公牛般紧张地冒着烟。

我走下楼梯,到咖啡馆去找那杂种,上帝保佑!两个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女士绽放着加勒比海式的笑容,用高耸的羽毛稻草帽挡住了我的去路。她们的帽子在我破旧住处粗陋的楼梯上投下椰子树般的阴影。你关心这个世界吗?她们问道。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其中穿着拼布长外套的女士就抛出一个末世预言震慑我: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上空的臭氧层空洞?

臭氧层?我问。

是的,臭氧层。那是保护我们不被太阳光灼伤的大气层。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儿上面有了个洞,而且在不断扩大,马上我们就会被烤干。只有蟑螂才能生存下来统治地球。但是请不要绝望,年轻人,因为今天你就有机会救赎自己,只要买这本杂志——我手头刚好有几本——并且参加我们在王国大厅举行的圣经集会。此后,我英俊的小伙子,你就可以到地下室聆听我们领袖的讲话(他会一手拿着块饼干,一手拿着个一次性杯子),他会告诉你输血(不管通过注射器、医生还是变态性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只有那时你才有机会。忏悔吧!这个女人高喊着

把圣经翻到作了记号的一页。她朗读起主的教诲：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买本杂志吧（主的话语也包含在内），我儿。边读边忏悔！

多少钱一本？我一边问一边把口袋从几枚硬币罪恶的重量中解放出来。这些硬币上刻画着偶像崇拜的图案，分别有几只鸭子、几只鹅、几头熊以及几颗权威的头颅。它们是我的全部家当。

请把这些硬币交给我并且祈祷，因为这样，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拯救者耶稣的垂怜，在踏上通往天堂的阶梯时你可以俯瞰你那些让我们吃了闭门羹的邻居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像馄饨一样在油锅里翻滚。我向你保证我们的主会对他们的处境和苦难视若无睹，对他们痛苦悔恨的哀号充耳不闻——是的，痛苦！愿上帝拯救我们免受此苦。

我吻了吻这两个耶和華见证人教派女士的手。我请求她们在那滚烫的末日来临之时眷顾我。死于火中是件可怕的事。如果非要选的话，我肯定希望是某种不太痛、更干脆，也许甚至更诗意的方式——比如吊死在柳树上，或者脑袋挨枪子，或者伴随着煤气泄漏的味道沉沉睡去直到永远。

我告别了那两个女士，跑向圣洛朗街的艺术咖啡馆，仍然希冀能在乌烟瘴气、满嘴咖啡味、靠救济金过活的人堆里找到雷扎。我的脚踩在潮湿的地面上，感到彻骨的寒冷。我诅咒自己的运气。我诅咒那班把我带到这片酷寒土地的飞机。我沿着街道望了望，犹豫地往东走去，小心翼翼地避开每一寸泥泞，试着对汽车轮胎轧过积雪发出的摩擦声充耳不闻。然而这声音敲击着我的鼓膜，不断让我想起飘落的雪花。它们安静而孜孜不倦地聚拢、堆积，占领每一块挡风玻璃、每一顶帽子、每一个垃圾桶、每一块眼睑、每一个屋顶和每一片山脉。而那些透着肋

迫的重靴呢，我的朋友，它们包裹着人们的双脚，以及那些塞着羊毛和头带、什么都听不见的耳朵，翻飞的、如同鬼魅般穿梭的衣摆，掩埋的面容，噉起的嘴唇，硬朗的双手？该死的！这个冷飕飕的地方没有人点头，没有人羞涩地挥挥手，那抽搐的红通通的鼻子里没有一丝笑意。所有这些埋在脖子上的头颅都缠着化纤围巾。这让我紧张。我问我自己，我在哪里？我在这儿干吗？我怎么会被困在这具不停颤抖的尸骸里，行走在一座不停有湿棉花从天而降的冰封城市里？最重要的是，我饥饿，困窘，无依无靠，孑然一身……该死的冰，只要一不留神你就会掉进那些奸诈的冰窟里，它们如水手妻子般耐心，如沼泽怪物般讥诮，等待着你的失足。你尽可以诅咒，但还是得忍受冻僵的脚趾、湿袜子发出的噗嗤声、如接生婆双手般黏糊的潮气，以及街上层层叠叠从你身边掠过的大衣，它们翕翕合合，翻飞鼓胀，如同驶向福地的风帆。

我无药可救！

我走进咖啡馆，把自己从层层帽子、手套和围巾中剥离出来，从数不清的拉链和纽扣中释放出来，忍受着魔术贴如史前爬虫般发出的啞啞声，它们像人的生命一样分离、被撕裂，就像流亡者跌落在出生和铁锹下的死亡的裂缝里，那铁锹挖掘的声音就如我身侧汽车轮胎倾轧积雪的摩擦声。

我发现尤瑟夫教授独自一人坐在他惯常坐的位子上。那个懒惰、装模作样、冒充法国知识分子的阿尔及利亚人永远穿着华达呢套装，打着从来不换的七十年代流行的窄领带。他躲在六十年代的眼镜背后，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抽烟斗，试图以此赶上法国思想家。他整天坐在咖啡馆里，大谈革命和文学。

我问教授有没有看见雷扎，那个伊朗音乐家，但是他并没有回答我。他只是给了我一个高傲的笑容。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教授想用他的存在主义问题溺死我。这杂种一有机会就扮演苏格拉底。他把所有人当成广场台阶上懒散的雅典学生，并且他从不回答问题。他把自己想象成伪社会主义伯伯尔记者，但实际上他不过是个一文不名的牧师，总是用一个问题回答另一个问题。

有还是没有？这事儿急得很，我尖声朝他叫道，试图打断他的认识论阴谋。

不！我没见过你朋友。教授再次对我露出嘲讽的笑容，抽了口烟，把腿的姿势换了换。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用一种知识分子的冷漠神情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农民，配不上他那副厚厚的近视眼镜。他不信任我。他透过烟斗的烟雾嗅着我。我知道他怀疑我偷了他最后的烟草袋，我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他没办法证明。现在我一接近他，他就不断在椅子上变换姿势，仿佛要说点什么有价值 and 深刻的东西，但是透过雾霭我看得出来他在把财物往身边收，抱紧自己的包，就像船上的难民。

我离开教授，恨不得把雷扎那个中东驼子用他自己的琴弦勒死。他欠我的，我急需钱。他总是能从我这儿榨钱，手段层出不穷。他要不就对我大谈波斯伟大历史，要不就重演他母亲的泪水，声称自己在她死前也没法再见她一面，因为他是个不幸的流亡者。但是我知道雷扎不过是想麻痹自己的嘴和脸。他总是吸溜鼻子，不是因为感冒就是因为过敏，再不就是一种用“哥伦比亚白糖”扑鼻子的自然冲动，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但是眼下我什么都做不了，只好再次套上御寒的盔甲，回到房间等雷扎打电话过来。

我躺在床上，伸手去够香烟，接着不明就里地突然警惕起来，或者说忧郁。这种感觉并不像心理医生在她傻乎乎的笔记里写的那样，是

偏执(我想办法偷到了笔记);只是我需要逃离太阳,什么都不想看到。这是我的渴求,我想把世界与身边的一切剥离开,然后存在于一切之下,没有物品、人、光,或者声音。我需要展开一条永恒的毯子,把一切都遮盖起来,封印天空和我的窗户,把世界变成一出昆虫剧。

几个小时之后,已经是薄暮,我打算去雷扎家里找他。我冒着严寒走到他家,摁了门铃,在门口等着。雷扎的室友,漂亮的法国服务员玛蒂尔德打开了门。她一看见我就想把门关上。

我用脚抵住门框,柔声说:我担心雷扎出事。

那就去报警啊,上这儿干吗? 哼。这事儿和我没半点关系。他上个月的房租都没付。我已经受够你们俩了。

我能进屋说吗? 我说。

我已经说过了,他不在这儿。

我只想去他房间里看看,我说。

可是他不在里面,你太过分了。

求求你了,我恳求她。我向玛蒂尔德施展我那双无精打采怯生生的眼睛的威力。

你只能进他的房间,她说。不许进厨房,不许偷卫生纸,明白了吗? 我和你在那个餐厅上班时大家都说是你在偷卫生纸,他们因为这个都瞧不起我,因为你是我推荐的。

我注视着玛蒂尔德扭动着结实的屁股朝厨房走去。我缩回自己原来的模样,把脖子往肩膀里弓。当我死死盯着她那华丽的、雄伟的、高贵的法国臀部时,我觉得自己的牙齿正慢慢变得尖利——我研究它,调查它,评估它,享受它的每一次晃动。她还穿着睡袍,衣摆刚好到大腿根。而且她还赤着脚!

我叹了口气。我仍然缩着脖子，摩擦着双腿。接着，一种错位的、无依无靠的、悲惨的、困在官僚主义和移民局走廊里的绝望感促使我转过身躲进雷扎的房间。

他的房间弥漫着臭袜子和廉价的老烟枪味道。房间里几乎没有光，但我还是认出了那台从他的波斯朋友西斯曼那里继承来的黑白电视机。西斯曼是名程序员，已去了美国，因为他说那里钱更多，而留在加拿大没有未来——税太多了。至少在一次伊朗聚会上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时，这个脑袋空空、一心想要飞黄腾达的技术人才是这么说的。那次聚会上充斥着伊朗流亡者——落跑艺术家、逃难诗人、卷大麻的左派、开出租车的前革命家。那天晚上我还遇到了索瑞。哦，美丽的索瑞！她让我疯狂，让我一瞬间变形，开始啮咬纸盘子，舔舐塑料餐具，迷失在薯条袋子里（这些袋子发出冰裂和树枝折断的声音）。她那时正和一个叫法尔胡德的瘦个黑衣伊朗同性恋跳舞。他一边跳一边在她紧致的身体上摩挲。索瑞和他一样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她的胸脯随着廉价移民立体声喇叭独特而危险的嘶吼上下晃动。音乐暂停的时候，我尾随着她穿过拥挤的门廊，走进厨房。我突破一堆堆盘子、叉子和零食的重重阻隔，直到最后她把一片黄瓜蘸在沼泽一样浓稠的白色酱汁里，我才采取行动。我想从你男朋友那儿把你偷过来，就是和你跳舞的那个。

索瑞笑着惊叫，男朋友？男朋友！她笑得更响了。法尔胡德！她对着黑衣男人大叫。这人以为你是我的男朋友。

法尔胡德傻笑着朝我们走过来。他把胳膊搭在我肩上。其实我自己还在找男朋友呢，他温柔地悄声说，一边摇了摇臀部。他手里的饮料无论形状还是光泽都像根棒棒糖。索瑞笑着甩了甩头发走开了。

一整晚我都跟在索瑞身后；我像狼一样跟踪她。她去洗手间的时

候我把耳朵紧紧贴在门上,指望能听到她那含百分之十一浓度酒精的尿液从她秘密而柔软的双腿间自由落体。哦,我对着尿液落在陶瓷盆里自来水中发出的瀑布般的声响叹息。哦,我感叹着,想象着这些珍贵的水将沿着温暖而泛着潮雾的管道在冰封的城市下流淌。正是索瑞这样的生物所慷慨释放的液体保持着我们脚下土地的温度。我想象着这些优美的线条在地下的阴影中蜿蜒,金色而明亮,直接而灵活,洒脱而温馨,揭示了一个躯体曾经迎接、储存、转化和释放的一切,仿佛孩子的风筝线,仿佛婴儿的脐带。啊!那天我看到了救赎、重生和满眼金色的欢庆之线。

我向索瑞要她的电话号码。我不想给你,她说,但是我不介意你自己努力打听出来。那样更浪漫,你不觉得吗?她跳舞时望着我,有时朝我微笑,有时又不理我。我看得出我的绝望多么让她得意洋洋。她很清楚我甘愿像爬虫一样匍匐在她脚下,像集市上戴着锁链的熊一样跳舞,像凳子上的海豹一样鼓掌,像外来出租车司机仪表板上的迷你塑料狗一样点头。我想成为她的舞伴,让她随我在舞池中摇摆。我想把头埋在她胸前,呼吸从她黑色蕾丝内衣里散来的香气。

聚会后的那几天我恳求混蛋雷扎给我索瑞的号码。他拒绝了。那个自私卑鄙的流亡者只是用他拖得长长的声调说,你对她不是认真的。你只是想和她上床。她不是那种姑娘,她是个伊朗人。她就像我妹妹,我必须保护她不让你这种肮脏的阿拉伯人碰她。

但是,雷扎,大音乐家,我说,妹妹们也要被操,妹妹们也有需要。

这让他很焦躁,他诅咒了我一句,我不许你再见她!

但我还是见到了索瑞。我从她的舞伴法尔胡德那儿搞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有一天我看到他走在街上,快乐地蹦蹦跳跳,像小鹿班比一样一路小跑。那天我用一条大围巾包着脸,我飞也似的穿过马路站到他

跟前，像蝙蝠侠一样双手叉着腰。法尔胡德立即认出了我，尽管我戴着面具。他拉下我的围巾吻了吻我的脸颊，像小罗宾一样笑了。我立刻告诉他我爱上索瑞了，需要她的电话号码。

我得先问问她，他说。他的手在空中比划着，和他忽闪的睫毛保持同样的节奏。但她不是你该爱上的那种类型，亲爱的，他加上一句。

把她的号码给我，我会永远爱你，我向他保证。我把胳膊搭在他肩上，吻了吻他的额头。

他笑了。你真坏！他叫道，然后从小提包里掏出一支带泰迪熊头的钢笔，写下了她和他自己的号码。

我在雷扎的房间里找钱、食物、大麻、可卡因——我能从混蛋这儿弄到的所有东西。我打开他的抽屉，嗅他的床下，用手指在抽屉底下摸索，寻找他通常粘在那里的塑料袋。哪怕是一张公交车票也好——只要能偿还一点他欠我的债。但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穷困潦倒的餐厅音乐家把所有东西都吸进鼻子了。

我叫玛蒂尔德，但是她不回答我。我走到她房间。她半裸着躺在床上，正在读一本口袋书，烟雾从书页后面升起。她感觉到我沉重的呼吸和在她刮得光溜溜的大腿上游移的目光。她从书后面低声说，我想刚才我们已经说好了不准你进来。

如果你有雷扎的消息能不能打电话给我？

玛蒂尔德抽了口烟，没有回答。

这很要紧。

知道了。我会打电话给你。快走。求你了。

我走到公寓门前，打开门，用力关上，然后偷偷溜进厨房，慢慢打开冰箱。我把能拿的都拿了出来——食物、甜点——然后见好就收，踩着

厚厚的积雪回到家里。

厨房里的蟑螂嗅到我手里的战利品，开始像小狗一样流口水。我回到卧室，远离它们嫉妒的眼睛，坐在床上给自己做了个三明治。我想月底前一定得弄些钱回来，不然就得饿死在这冰冷世界里的某个该死的公寓里了，这座雪下个不停的城市。窗户打着呼哨，冰冷的空气从缝隙里钻进来；要我说这鬼地方破得不成样子。但是又有什么区别呢？从我出生以来生活就没什么变化。至少现在我是一个人生活，不用再和姐姐，打呼噜的父亲，会在半夜跳起来问你饿不饿、渴不渴、要不要去厕所（或者有没有睡着）的神经质母亲挤在一个小小的卧室里。我不再和行将成年的姐姐共处一室，那时她梦想着带枪的阿拉伯人，把左手放在被子下面，骇人地望着虚空，咬着嘴唇，用食指绕着圈，就像电影放映机转动的轮轴，在卧室墙壁上投射出性幻想。还有那仿若老露西电影院里男人发出的欢呼声，在那里二战影片、意大利肥皂剧、在狂奔的马背上颠簸的牛仔和印第安人画面中间夹杂着的情色画面一闪而过。露西电影院里，那些满是污渍、因沾满了精液而褪色的椅子忽明忽暗，兴奋的人们在手帕的陪伴下坐在地板上，他们把手帕挂在胳膊上，就像周五晚上的约会伴侣。这些男人像夜晚的游击队员一样，不耐烦地等待着正片中夹杂的情色片段；跳跃的动物马戏团，摔倒的小丑，波涛汹涌的大海和落日渐渐变暗隐去，变成入侵的欧洲军队，脚蹬高筒靴践踏着焦黑的山丘和铺着鹅卵石的广场，因为看到几个敬礼的军官和他们脚蹶臃肿的妇人而目瞪口呆，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世界。

我们坐在露西电影院里，等待着屏幕上玉体横陈。我们就像天使。接着，年长一些的男人觉得太多时间被浪费在古老记忆、战争、衰老的影星身上，他们开始边叫嚣边敲打旧椅子：黄片！阿布-哈里尔！黄片！阿布-哈里尔！顶不住压力，屏幕上出现了胸部的画面，后脑勺掩护着